

锦年盛时话美协

(上接9月13日5版)

为美协党组作会议记录

1964年是我在美协工作的第二年。经过一年的工作,我对美协内外的人和事都比较熟悉,在协调会员、组织画展、参与创作等方面已经游刃有余。美协内部,从沈柔坚、吕蒙到陈秋草、蔡振华,对我也很认可和信任。他们逐渐让我承担起更多更重要的工作。

《党章》规定,七人以上党员可以成立党支部。我们单位有八九个党员,和摄影家协会成立了联合党支部。张云聘是支部书记,宣传委员是办公室主任卢坤。支部成员推举我作组织委员。我一听诚惶诚恐,不敢当,那么多老前辈,哪里轮得到我,况且美协有了宣传委员,摄影家协会方面担任组织委员也合情合理。后来还是上级决定,说党员要服从组织安排,让我当了组织委员。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上海美协辉煌鼎盛,行政级别也高,是正局级单位。党组成员汇聚了美术界各领域的领导。美协的沈柔坚和吕蒙、人美的李槐之、上美厂的特伟、中国画院的程亚君、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的叶飞,上海儿童出版社也来人列席。此外就是我,因为当组织委员,不久后,我被安排参加美协党组会,负责会议记录和存档工作。

上海市文化局局长方行任党组书记,沈柔坚是驻会的党组副书记。我总感觉这俩人思路不太合拍,后来方行退休后,就是沈柔坚担任书记。

我知道,参加党组会是组织对我的信任,一定要遵守组织原则,严守秘密,因此从不把会议的情况透露给他人。也因能参加这个核心会议,了解到很多上海美术界重大决策的出台内幕。时隔一个花甲,当年会议讨论的许多细节早已淡忘,一些当年的秘密,早已不再神秘,但有一些情况仍颇具趣味。比如,有关上海中国画院的筹备和成立。

我到美协的时候,画院已经成立,美协主席丰子恺也任画院院长,只是他不常来美协,也不多去画院。零碎的信息中,我能拼凑出画院成立时的情况。

成立画院,赖少其功不可没,他位高权重,资历深,皖南事变后从上饶集中营越狱,为人敢担当,说话有人听。一些人因出身不好或说话不慎,处境艰险,赖少其保护了不少人。

画院成立,最大焦点是院长人选。当时有几个选择,一轮轮的讨论非常艰难。吴湖帆资格老,呼声最高;贺天健有华君武支持;王个簃和唐云思想进步,政治觉悟较高。这些候选者都是国画大师,水平伯仲之间,使抉择变得更加无措。最后确定丰子恺出任院长,王个簃、贺天健、唐云、程亚君任副院长。在所有的方案中,这是最优的结果,丰老画漫画,各方比较能接受。说到底,新中国成立初期,上海画坛大师云集,名家太多了。

陈佩秋推举我做组长

我和很多名家都相熟,他们都是美协会员。其中,与陈秋草和唐云两位接触最多。

陈先生祖籍浙江宁波,祖上富足,家乡有良田万顷,传到 he 手里,因为热爱美术,陈先生变卖了大部分家产,创办白鹤画室,收藏古董名画,资助朋友。钱没了,其眼光和修养却精进不已。刚到美协的时候,我看到很多人,包括美协、画院的人,经常向陈秋草讨教,拿东西请他鉴定。

美协的这些副主席和副秘书长,张充仁不怎么来,唐云经常来。他妹妹在美术展览馆工作,他们兄妹手足情深,



图为胡振郎创作的人物画《兽医姑娘》。该画入选全国美展,后被十多家报刊报道。

他也经常去展览馆溜达。

唐云性情豪爽,乐善好施。有的画家敝帚自珍,惜墨如金,难得送画;有的画家不轻易给人画,怕仓促间画不好,失了水准;有的画家懒,不爱动笔。唐先生好说话,有时他已经很累了,参加完活动或者刚开完会,满头大汗,有人凑过来,说:唐先生,给我画张好吗?他几乎都欣然应允。唐云人缘特别好,大家都喜欢他。

不过,唐云的慷慨,也给自己身后带来了苦恼。唐云一生画了不少画。后来,杭州成立他的艺术馆,他却拿不出东西,作品都送人了。据说有人手里有他上百张画,但舍不得拿出来。

唐云见多识广,鉴赏水平极高。我有次看中一只白瓷镂空笔筒、一个铜盘,但没把握。问唐云,他只搭一眼,就点头,说:小胡,可以买。我买下来,至今还在用。

陈秋草和唐云两位先生,为国家收购来不少珍贵藏品。任伯年一幅《群仙祝寿图》,说是国宝也不为过,就是通过唐云从著名收藏家钱镜塘先生手里购得的。我听说,唐云经手和把玩过的珍品不计其数,他床底下堆着很多好东西。

任伯年的这幅《群仙祝寿图》,真迹我见过,叹为观止,真正的惊世之作。十二条屏通景构成的组画,表现西王母庆蟠桃会的隆重富丽场面,画中有西王母、宫女、群仙共46个人物。与别的仙界题材绘画不同,任伯年笔下的神仙形象平易近人,可亲可爱。这幅画始终收藏在上海美协,当之无愧的镇殿之宝,不轻易示人。

远在西安的画家刘文西,得知上海美协收藏《群仙祝寿图》,非常神往,与夫人陈光健专程来到上海,恳请沈柔坚同意,临摹《群仙祝寿图》。他们夫妻是同班同学,1958年从浙江美院国画系毕业后,双双被分配到西安美术学院任教,可以说是我的师兄学姐。

这夫妻俩科班出身,都是人物画高

手,一起动手,《群仙祝寿图》十二条幅,临完一幅换一幅,整整临了一个多月。其间,他们就住在上海美术馆楼上。我一直照顾他们,彼此建立了很深的感情。

刘文西夫妇对那次上海行印象深刻,对自己临的《群仙祝寿图》很满意,很珍惜。我也很羡慕他们,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来之不易,书画界多了一份任伯年作品的摹本。美协不比专业的美术馆、博物馆,展品不对外开放,公众难见藏品。有了摹本,书画爱好者多了观赏的可能和机会。

在美协工作,常能见到外地来访的书画大家。1964年,苏州的费新我来访,大书法家,字写得好,给我写了一张留念,我现在还留着。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是中国画坛的黄金时代,画家思想活跃,创作激情火热,佳作迭出。各个画派相互交流,相互尊重,关系都非常密切。傅抱石、亚明也来过,我也参与过接待。当时,金陵画派专攻山水,在美术界造成一定声势。我当时存着画山水的志向,这是大学分科时就有的想法,一直没幻灭,所以很是留意金陵画派。

之前,傅抱石、亚明、钱松岳等几位金陵画派的代表人物,组织了一次“壮游长江万里”活动,回来后,出了一本作品集。我买来研读,对其中钱松岳的话记得深刻,不看真山真水,就没有资格画山水。他的观点和石涛一脉相承,是画家亲身经历的真知灼见。我在多年的山水写生中,对这句话愈加认同。

长安画派的石鲁、赵望云、方济众、刘文西也来过美协。他们依托西安美术学院,文化底蕴深,作品讲究意境,比如石鲁的《东方欲晓》《转战南北》,我都仔细看过,极为欣赏。我在美协见过关山月、黎雄才、杨之光等岭南画派代表人物。

海上画派的成就主要在花鸟画领域。当时,江寒汀、张大壮、唐云、陆抑非合称花鸟画的“四大名旦”。

这一年,美协组织上海画家,去北京举办了一场花鸟画专场展览,影响很大。海派也有山水,吴湖帆、陆俨少、贺天健、应野平、俞子才也创作出不少经典

作品。当时,老一辈画家都在,很多后来崭露头角的中青年画家,还寂寂无闻。

此时,美协中国画组长是王个簃、副组长陈秋草、唐云。王个簃说自己老了,建议改选。我通知大家来开改选会。会上,陈佩秋推举我做组长。这一年我才27岁,准备卸任的王个簃是吴昌硕入室弟子,我怎敢和他比肩。我连忙表态说:不敢,不敢。不料,与会人员却支持陈的建议,非要让我担纲。我想,组长万万不可,于是提了一个折中方案,说:我做副组长吧,挑担子,具体干活,你们从中国画院找个组长,有身份,有资历的。最后定了邵洛羊,当时,他是画院业务室主任。

《兽医姑娘》出了年画

再说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协的展览。没有调查,就没有发言权,我在美协工作,了解上面的政策动向,当时整天跑基层,熟悉情况,心里有底,所以上海美协要举办什么展览,无论是何主题,美协主办还是协办,我都知道哪里下手,比如谁擅长这个题材,放在哪里举办效果好、影响大。

1964年6月,美协举办“生活新赞”

上海国画人物画展,秘书长吕蒙让我发通知下去,广泛动员,包括新来上海的美术院校毕业生,都到美术展览馆开会。美协通知一发出,所有人都到了,我看着手里名单,知道和自己一起来到上海的美术新人是54个,来自北京、杭州、西安、南京、广州、沈阳等地。

组织“生活新赞”展览时,我到美协工作不到一年。这是上海美术史上第一次人物画展,以前没有过。让我组织这场活动,有多种因素,既是美协人手紧张,也是我一年来的工作得到认可,何况我还是画人物画专业,美协领导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可以承担。于是当仁不让,挑起了这副担子。

这次画展很成功,《解放日报》等进行了报道。美术界知道上海建立起一支能创作的人物画队伍,弥补了这方面的短板。通过这次展览,上海美术都知道,美协新来了个年轻人,叫胡振郎。

之后是“公社风光美术作品全国巡展”,从北京到上海,再到广州,由北向南,上海是展览第二站。

公社风光,这个题材对我应该不成问题,但当时已经比较忙,来不及重新创作。我将浙江美院三年级时的旧作《公社兽医》稍加修改,重新命名《兽医姑娘》,提交展览。因为切合了形势,又有独到之处,在北京展览期间,这幅作品颇为轰动,《美术》杂志、《人民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文汇报》《新民晚报》对此都有报道。当时,我刚到美协,忙于工作,没想到在创作上也引人关注,自己感到很自豪,把有关此幅作品的报道,都剪下来保存,迄今还有17张。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对这幅画感兴趣,请我用工笔重彩又加工了一番,作为新年画出版发行。为此,我到上海人美待了一个月,其间结识了韩敏、刘旦宅等好友,还拿到一笔丰厚的稿费。

年画发行量大,边远农村都会张贴。1974年,我去西藏,西藏美术界一位朋友说十年前就通过《兽医姑娘》认识了你。黄苗子的爱人,著名女画家郁风,看画后,马上动笔写了一篇评论文章。举办展览的中国美术馆联系我,希望等巡展结束,能收藏这幅作品。可是,天有不测风云,巡展结束,已经1965年底,事情也就不了了之。

这一年,还有一个军事题材画展,记得上海的张培础和吴彤章都参加了。张培础当过兵,他创作的《闪光》就在这次画展推出,成为他的一幅代表作。展中,我写了一篇文章,评论《童年旧居》是我的第一篇文艺评论。

胡振郎 口述 邢建榕 魏松岩 撰稿